

杨殷研究四题

□胡波

杨殷，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著名中国工人运动领袖、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主要领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情报工作开拓者，虽然在他牺牲之后中共中央对其革命奋斗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并采取了多种形式对其进行了深切的怀念和真诚的纪念，但是，相对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和革命先烈的研究而言，对杨殷的研究和宣传还处于初始阶段。尽管1993年何锦洲的《杨殷传》和2012年郭昉凌的《杨殷传》等传记相继出版，也曾有杨殷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翠亨红棉》的编撰和电影《义薄云天》的问世，但与杨殷光辉的一生和崇高的革命精神相较而言，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宣传普及的广度，还远远不够。

一、先烈：为什么就是杨殷

1945年4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上，毛泽东简要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24年历史时，曾满怀豪情地说：“我们党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的确，“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没有暴力革命就不能推翻一切奴役人的旧制度，没有牺牲就不能消灭私有制，因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

出身于殷实家庭的杨殷，虽然自幼就承受“女子要贞洁，男子要忠义”的家训，谨守“忠孝”之道，但对“革命就有流血牺牲”的话语并不陌生，甚至被同村的前辈如孙中山、陆皓东、杨鹤龄、杨心如等的反清革命故事所感染。尤其是被孙中山誉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国革命而牺牲之第一人”的陆皓东的革命故事，给杨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95年孙中山发动的广州起义失败后，避居港澳的杨鹤龄因膝下无儿，对堂侄杨殷格外疼爱，经常给杨殷讲述革命故事，他们叔侄之间的关系自然拉近了。杨殷因此也对孙中山、陆皓东和叔辈的革命斗争有了初步的认知，知道陆皓东是为拯救民族危机为民请命而牺牲的，并对其临危之际，挺身而出，凛然献身的英雄气概肃然起敬。在日常生活中，杨殷主动接近陆皓东的遗孤，要小伙伴们不要欺负陆家兄弟，认为“谁欺负陆家兄弟，谁就是清廷的走狗”。显然，少年时的杨殷从同村同宗和同乡的前辈、尤其是革命先烈的言谈举止和革命故事里，已经对孙中山的反清革命的价值和意义有了自己的判断，并且对革命斗争和流血牺牲有了真切的感受。

如果说同村先烈陆皓东的慷慨捐躯对年少的杨殷来说还只是一个道听途说、口口相传的悲壮故事而已，对杨殷幼小心灵的触动还没有那么深切，那么被誉为“茂宜王”的孙中山的大哥孙眉因倾家支持革命而破产，回国后仍然不忘革命斗争的客观事实，以及族叔堂兄等敢于反对清政府，不畏艰苦，不怕牺牲，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则更容易使身历其境并逐渐长大成人的杨殷自觉地进行身份认同和角色扮演。他在香港和省城读书期间，常与孙眉、杨鹤龄、杨清初接触，并帮助他们运送武器、联络党人。1911年年初，19岁的杨殷由孙眉主盟，加入中国同盟会。受孙眉的指导，杨殷一开始就投入黄花岗起义前的紧张工作，主要负责秘密交通联络工作，奔走于湛江、澳门、香港、广州、香山等地，联络同志和会党，传递情报，收集信息，发挥了很好的沟通联络作用。但是，黄花岗起义因寡不敌众，100多名革命党人英勇献身。作为参与者的杨殷，为这些革命烈士抛头颅、坚贞不屈的精神所激励，对生死因此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根据组织的安排，当时杨殷可以在国外从事联络工作，他也明白在国外从事革命工作相对国内而言，肯定安全一些，但他还是选择了在国内工作。他说，“国外城市虽然华丽，但我们是炎黄子孙，为挽救中华而献绵薄之力。国内从事革命活

动随时有杀身的可能，但革命者以革命事业为乐，以救国为乐，即使赴汤蹈火，也万死不辞”，并婉言谢绝好友相劝，仍回澳门、香港、广州、香山等地开展革命活动。

1913年，宋教仁被刺身亡，二次革命再起，杨殷追随孙中山，投身于反袁护国护法运动。1914年，杨殷在苏州、杭州、上海一带联络革命同志时，从上海会党中的许凤山那里得知参与暗杀宋教仁的袁世凯心腹郑汝成的行踪，便做好了刺杀计划。他怀揣炸弹，扮作路人，等候在郑汝成必经之地。一天，郑汝成骑着马，像往常一样招摇过市地出现在杨殷守候之处。杨殷抓住机会，在路旁向郑汝成抛出炸弹，炸伤了郑汝成。在一片混乱之中，杨殷不慌不忙地进入一家理发店，机智巧妙地避过了军警的搜捕。他这种荆轲刺秦王式的勇士精神，受到革命党人的称许，也给孙中山留下了深刻印象。

其实，对杨殷来说，他也深知无论是秘密进行的组织联络，收集情报，传递信息的暗杀等革命活动，还是公开的面对面的武装斗争，都不可避免流血牺牲，都时刻存在家破人亡的危险。尤其是在他作为追随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名国民党员，转变为一位坚定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员，成为早期工人运动的组织者和保卫者，以及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保卫和情报工作领导者，杨殷不仅耳闻目睹了无数革命同志英勇牺牲的悲壮故事和血淋淋的场面，而且亲身经历了许许多多生离死别的惨痛和死里逃生的幸运，因此，他把生与死置之度外。在他的内心深处，始终蕴藏着这样的信念：为中国大多数贫苦人民谋幸福，毁家纾难，在所不惜；为贫弱的中华民族谋复兴，舍生取义，义无反顾。但是，他也不是那种不注意自我保护，盲目冒进，作无谓牺牲的一介莽夫。他不仅遇事沉着勇敢，而且机智果断，既武艺高强，又足智多谋。他常对同志们说：“革命要求我们做的，不多也不少，八个字：谨慎、勇敢、沉着、机智”。对敌斗争，既要临危不惧，生死相搏，又要机智灵活，化险为夷。他自己在多次身临险境时，都能从容脱身，就是最好的例证。

1927年在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制造四一二、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上海、广州乃至全国各地。虽然曾与杨殷一起从事革命工作的领导和近百余位同志先后被捕、惨遭杀害，他自己也多次死里逃生，但是在血雨腥风的环境里，杨殷不仅没有畏惧和退缩，反而更加坚定了革命意志。一方面，不顾个人安危，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和情报网络，营救被捕的同志，肃清叛徒和反革命分子，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另一方面，不计个人得失和安危，主张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武装。在1927年12月11日召开的广州苏维埃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杨殷报告肃反工作时就说：“起义前，我们已成立了几个肃反小组，准备捉拿国民党反动派头子。但是，起义枪声响后，革命武装去逮捕反动头子时，汪精卫、陈公博、张发奎、朱晖日等家伙都已逃脱了……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必须镇压反动头子，使它们不能为非作歹、横行霸道。我们已把一些罪恶累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警察头子、反动军官、侦探长、党棍处决了……目前，革命武装、肃反小组正在分头出动，肃清盘踞在某些据点上的残余敌人及追捕敌党、政、军、宪兵、警察、特务头目，并希望各部门协助，共同做好肃反工作”。广州起义失败后，杨殷等广州起义领导人均受到处分，尽管杨殷本人不同意这种惩办主义的做法，但也不为自己申辩，对个人委曲荣辱也不耿耿于怀，仍像过去一样积极为党工作，甚至还鼓励同志们要“更努力准备我们的力量，为被难的工友农友士兵复仇，为先烈遗留给我们的苏维埃口号而奋斗！”

正因为杨殷对革命斗争的严酷性有着充分的认识和思想准备，也正因为他对中国共产党事业的忠诚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所以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他时刻都准备着为国为民为党捐躯。1929年8月24日，杨殷、彭湃、颜昌颐、邢士贞被叛徒白鑫出卖被捕后，杨殷并不为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官厚禄利诱所动，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崇高革命气节。在狱中，敌军官对他说：“你是老同盟会会员，曾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是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人。现在，只要你回心转意，重归国民党队伍。我们一定不会亏待你，可以安排一个高级官职给你。你可以逍遥快乐，享受富贵荣华。如果你不归顺，只有死路一条。

何去何从，任你选择。”对此，杨殷的态度是：“你们是国民党反动派，是一伙祸国殃民的反动家伙，要我给你们投降，这是绝对办不到的。我只坚信共产主义，而不相信你们的鬼话。现在不幸落入你们手中，要杀要斩，听你们的便。”他和彭湃商议写信给党中央，在报告狱中斗争情况及营救的线索的同时，也明确地表示，“（一）尽量设法做到五人通免死刑。（二）上条不能做到，则只好牺牲没有办法之安揆二人（指他和彭湃），而设法脱免余无口供之三人。”在就义前他们联名写信给党中央，再次劝告同志们，“不要因为弟等牺牲而伤心。望保重身体为要！”在获悉不能同时营救5人出狱时，杨殷和彭湃选择了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换得他人的生存。杨殷甚至还写了一封家信，通过其他渠道给他的家属，教育儿女要继承他的遗志，从事革命事业。在经历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逼利诱和残酷摧残的情况下，他仍然不出卖任何一位同志，也始终不泄露一丝党的秘密。临刑前，从容自若，笑对难友说：“朝闻道，夕死可矣！”牺牲时才37岁。

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也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在生死关头，杨殷选择把“生”让给同志，而自己却坦然就义。虽然如同周恩来所言“这原是成功前所难免的事变，而且是革命成功之血的基础。没有前仆后继的革命战士，筑不起伟大的革命的胜利之途！”“每一个革命战士牺牲，不管是在前线，是在后方，都有他伟大的代价，尤其是革命领袖的牺牲，更有他不可磨灭的战绩，照耀在千万群众的心中，熔成伟大革命的推动之力，燃烧着每一个被压迫群众的革命热情，一齐奔向革命的火原！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说，“彭、杨、颜、邢四烈士的牺牲是中国革命、中国党之很大的损失！”因为“革命的领袖是积了无数次的斗争与战绩，从广大的群众中涌现而锻炼出来的。敌人可以在几分钟内毁灭了我们革命的领袖，我们却不能在几分钟内锻炼出我们新的领袖。”的确，杨殷的牺牲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损失，对杨殷家庭来说也是莫大的不幸。但杨殷选择牺牲，不是一时的情绪冲动，更不是毫无生路可走时的无赖之举，而是一位饱经风雨、久经考验、立志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的英勇抉择，他履行了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誓言和承诺。

二、精神：为什么价值永存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为悼念张思德而作的著名演讲《为人民服务》时，曾这样指出：“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杨殷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比泰山还重，尤其是杨殷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仍然忠诚于党忠诚于革命事业，把生留给战友，把死留给自己，毅然走向刑场，体现的是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斗志和始终不渝的品格。他的这种崇高的革命精神比泰山还重，比大海还深。

杨殷等4位烈士牺牲后，中共中央就指出“彭杨诸领袖革命精神不死！”周恩来在《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一文中也强调：“烈士的革命精神不死！1929年9月29日上海各界为追悼彭杨颜邢四位烈士所印发的《为追悼被国民党惨杀的彭杨颜邢四革命领袖告上海民众》中再次呼吁“彭杨颜邢四领袖革命精神不死！”“继续四领袖革命精神！”对杨殷等革命烈士的革命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对杨殷崇高的革命精神和品德风范再一次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在他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不怕牺牲的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品德风范和始终如一的先进性”，称他“是英勇斗争，不怕牺牲的典范”，“是追求真理，对党忠诚的典范”，“是舍己为党、无私奉献的典范。”可见，杨殷虽然牺牲时才3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并不长，但他为党为人民而努力工作，不怕牺牲的精神给党和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杨殷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一名同盟会会员和国民党党员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共产党党员和革命战士的典范。他对党无限忠诚，对革

命事业也无比热爱，对广大人民群众更是一片赤诚。正如何锦洲在《杨殷传》中所言：“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他短短的一生中，曾经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国民党反动派、买办阶级、地主恶霸、土匪、反动会道门头子、叛徒、特务等形形色色反革命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他工作积极，埋头苦干，扎扎实实地把党交给的各项任务认真地完成。他党性强，作风正派，光明磊落。他顾大局、识大体、敢于负责，勇挑重担。他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在会议上充分发表意见，一经作出决议，即毫不动摇，坚决执行。他对待同志热情诚恳，乐于助人，深为同志们所敬佩。他崇尚节俭，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乐意为工农群众谋利益，赢得了广大人民爱戴。他生命不息，斗争不止，特别是身羁牢狱危难之际，仍然英勇战斗，铁骨铮铮，坚贞不屈。他没有不良嗜好，终生致力于革命事业，是一个完全为党、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而战斗的坚强战士。他一心为公，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把毕生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可以说，杨殷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党的早期军事工作的重要领导者和情报保卫工作的重要开拓者之一，而且是一位品德高尚、精神崇高的革命先烈，无疑也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但是，对于杨殷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的认识和了解，今天似乎还停留在纪念性的话语层面，对其革命精神的内涵和崇高品德的价值，仍然缺乏深入的研究和全面的阐述。虽然有少数学者如陈登贵等曾对杨殷的革命精神作过专门的总结，认为他的革命精神表现在：爱憎分明，勇于献身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精神；拒贿赂，廉洁奉公的精神；赤胆忠心，把党的事业放在第一位的精神。应该说，这是对杨殷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的一次比较全面的评述，但仍然过于简单，缺乏更加具体的有说服力的生动事例，没有真实地体现杨殷光辉的战斗业绩和饱满的革命斗志以及崇高的革命精神。

其实，杨殷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都具有不可磨灭的光辉和永不褪色的价值。尽管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精神，但至诚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廉洁为公的奉献精神，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团结合作的互助精神，不怕牺牲的奋斗精神，则始终是时代精神的主旋律。尤其是杨殷的一生，不仅充分展现了这种时代精神的主旋律，而且他一生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表现出崇高的党性精神。因此杨殷精神不仅具有历史的意义，亦有时代的价值，值得深入地研究，持久地学习，永远地弘扬。

其一，是杨殷的至诚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杨殷的一生，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英勇奋斗的一生。无论是他少年时代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加入同盟会，在广州、香港、澳门等地开展反对清朝专制统治的革命活动，还是辛亥革命后，坚持在孙中山领导下进行反袁护国运动和护法斗争，也无论是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发动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组织工人支援北伐的胜利进军，还是参加领导著名的广州起义，参与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党的武装斗争以及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的领导工作，成为党的情报保卫工作的重要开拓者，所有这一切，都与他的爱国报国、爱民救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血脉相连。

其二，是杨殷的廉洁为公的奉献精神。杨殷从入党到牺牲，始终把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早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他在广州西关盐务稽查处任师爷，专职从事防止盐商走私漏税、制止各地盐务官员贪污盗窃和接受贿赂的工作。他秉公办事，不徇私情，专门同失职、渎职、贪赃、受贿官员及不法商人进行斗争。他作风正派，廉洁奉公，一尘不染，敢于揭发走私漏税、贪污盗窃、受贿等违法行为，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毅然舍去待遇优厚的盐务师爷这份美差，将年幼的子女托付给亲朋抚养，拿出积蓄，变卖田舍，甚至将妻子的首饰遗物也全部变卖，交给党组织作为活动经费。被捕入狱后，他主动向党表示如果不能同时营救被捕的五位同志，他宁可选择牺牲自己也要确保同志的生命安全，表现出廉洁为公、心甘情愿的奉献精神。

其三，是杨殷的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杨殷从小就生活在一个相对开放而又敢为人先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同乡先辈如容闳、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唐绍仪、孙中山、陆皓东、杨鹤龄、杨心如、孙眉等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对杨殷的影响可谓耳濡目染、润物无声。杨殷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胆大心细，灵活果敢的性格特点，就有同乡先贤影响的痕迹。与他一起从事革命工作的李少棠在回忆中也认为：“杨殷个子中等，身体强健，平头装，说话庄重，话音略带故乡中山土音，长着一幅圆圆的红润脸庞，一对观察事物锐敏的眼睛，是一个沉毅、勇敢、机智、果断的人。”在从事党的情报保卫和组织宣传工作的过程中，虽然遇到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险境，但杨殷都能够沉着机智，巧妙有效地排除或化解，表现出极强的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

其四，是杨殷的团结合作的互助精神。杨殷曾对战友说：“自鸦片战争后，资本帝国主义纷纷侵略我国，使我国割地、赔款，金融、铁路被外国控制，造成我国日弱，人民日穷。堂堂大国，人口占世界首位，竟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任由帝国主义列强宰割。这是每个爱国的人所不能忍受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推翻封建皇帝的专制统治，建立共和，才能拯救中华，振兴祖国。”团结是革命事业成功的重要原则和方法，合作同样也是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动力和助力。建立最广泛的爱国主义统一战线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杨殷最可贵之处正在于他性格豪爽、仗义疏财、好交朋友，不仅善于团结同志，而且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在革命的组织、宣传和领导工作中，总是顾全大局，擅长与不同的人打交道，善谋团结合作，甚至甘当配角、不争名利，补位而不越位，到位而不抢位，表现出团结合作、同舟共济的互助精神。

其五，是杨殷的不怕牺牲的奋斗精神。有斗争便会有流血，有革命便会有牺牲，这是杨殷自青少年时期就已明白的道理。但正是因为从小受孙中山、陆皓东、杨鹤龄等同乡先贤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的影响，少小立志救国救民，从追随孙中山进行旧民主主义革命，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杨殷始终将生死置之度外，时刻准备着赴汤蹈火，抛头颅洒热血。即使在被捕入狱后，深知难以生还，但他在未死的那一秒钟以前，仍努力做党的工作，向士兵宣传，向警士宣传，向狱内群众宣传。不怕牺牲固然是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但在杨殷这里更表现出英勇无畏、大义凛然、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奋斗精神。

其六，是杨殷鲜明而又坚定的党性精神。党性是一个政党固有的本性，是阶级性最集中和最高的表现。党性还有鲜明的时代性，这是千百万共产党人为了完成党在各个时期的任务，英勇奋斗、忘我牺牲、开拓进取实践的升华。党性对每一个党员的要求集中体现在入党誓词之中：“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杨殷的一生，无私奉献给了党和人民，他始终谨守自己的誓言，严格按照党的要求办事，忠于党忠于人民，以不怕牺牲的奋斗精神，团结合作的互助精神，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廉洁为公的奉献精神 and 至诚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展现了共产党人鲜明而又坚定的党性精神。

三、研究：为什么还要深入

毛泽东曾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解才解决本质问题。”同样，学习和弘扬杨殷精神，首先必须了解他的生平事迹，思想理论和精神风貌以及人格品质。而杨殷的生平历史研究和思想理论探索，以及精神品格的深层分析，则是认识和理解、学习和弘扬的前提和基础。

虽然杨殷牺牲距今已有 80 多年，有关他的生平事迹的历史研究和精神品格的学术探讨，以及纪念性的系列活动已经渐次展开，也产生了一批较有水平的研究成果，既有如 20 世纪 60 年代后相继问世的《南粤英烈传》（第一辑）、《中山英烈》（第一辑）及多种版本的《杨

殷传》和讲述杨殷革命故事的书籍，也有冯铁东、史莘的《广州起义中的杨殷》，郭昉凌的《杨殷与广州起义》，邓颖珊的《论杨殷为广州起义所作的历史贡献》等专题论文，更有《翠亨红棉：纪念杨殷诞辰 110 周年文集》的出版，但严格说来，杨殷研究还是刚刚开始，其辉煌的业绩和革命的一生，仍然有许多值得深入拓展研究和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本人以为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尚待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

其一，相关资料的挖掘整理和编辑出版，值得进一步加强。杨殷研究之所以难以推进和继续深入，根本的问题是日前掌握的资料太少。许多历史事件仍缺乏具体细节的材料，如杨殷在香港、澳门、广州、汕尾、上海等地活动的情况，缺乏史料记载，尤其是杨殷在苏联的活动和交往方面的材料，我们知道得太少。最近 10 多年，俄罗斯已将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相互往来的档案资料正式对外开放，中国已整理出版了部分资料。应组织专门的机构和专家，到杨殷曾经活动过的地方进行资料挖掘和整理、文物抢救和保护，并计划地出版相关史料，同时运用口述史的方法，采访与杨殷相关的人，了解相关的人和事，从而丰富杨殷研究的史料。

其二，以党史办和党校、高校和档案、方志等有关部门为依托，成立杨殷研究会，加强杨殷研究的组织管理和研究规划。杨殷研究一直人单力薄，缺乏专门的机构组织人力、物力、财力进行专题研究。应该像孙中山研究会、郑观应文化学会、香山文化研究会等民间学术研究团体那样，成立杨殷研究会，借助有关研究机构和社会组织的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广泛开展杨殷研究方面的资料收集整理，加强历史研究和理论探索，推动学术交流和宣传普及，使杨殷研究进入规范化和常态化。

其三，在过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力开展专题研究，在研讨和交流中将杨殷研究推向深入。第一，要着力研究杨殷的生平事迹，细化其生命中的重要节点，这是杨殷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过去虽然已有比较清晰的对杨殷生命轨迹的研究，但缺乏细节上的史实支撑，仍存有不少盲点区域或真空地带，需要再细致再深入地进行史事追踪。第二，要着力于对杨殷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过程进行研究，弄清楚杨殷从追随孙中山到参加共产党这段关键时期的历史脉络和具体细节，从根本上说明杨殷思想转变轨迹和心路演变历程。这方面的研究虽然已经启动，也发表了一些论文，但仍缺乏有足够的说明力和影响力的论著。第三，要着力于杨殷军事思想和情报保卫工作的研究。因在革命初期，一切都在草创阶段，既无经验又无借鉴，杨殷在军事斗争方面的探索和在情报保卫工作方面的实践，有成功的经验，也有独到的见解，值得进行深入研究和理论阐释。第四，要着力于杨殷与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相互关系的研究。杨殷早期从事革命活动，不仅与社会各阶层各阶级有广泛的联系，而且与中共早期领导人如周恩来、陈独秀、谭平山、杨匏安、刘尔崧、周文雍、苏兆征、林伟民、邓中夏、陈延年、张太雷、彭湃、恽代英、张云逸、刘伯承等均有过较密切的交往，对他们之间的合作和交往的研究，也会深化和拓展人们对杨殷的认识。第五，要着力于杨殷的革命精神和人格品质方面的研究。过去的研究侧重于杨殷的革命精神方面的评述，而忽视了杨殷高尚人格品质方面的探讨。虽然这两方面的文章较多，但纪念性的定性评价和道德意义上的价值判断，掩饰了杨殷精神的光辉和人格的魅力。第六，要着力于杨殷成长的文化土壤研究。杨殷成长的文化土壤和所处的时代环境，都缺乏更加宏观的考察和微观的透视，而这恰恰是杨殷的故乡——中山市应该着力发掘和加以研究的课题。尽管也有少数专家学者如黄振位、何锦洲、郭昉凌等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无论是从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远未达到应有的水平。第七，要着力于研究方法和理论的不断变革和提升。应该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不同角度多个侧面展开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研究

和教学全过程，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并强调，“不同学科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研究借鉴，不能采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态度。”杨殷研究同样需要借鉴中外哲学社会科学的好方法、好理论，需要多学科的通力合作。在跨学科跨领域跨地区之间团结合作，杨殷研究才能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如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政治学、哲学、军事学、情报学等学科的新理论新方法的参与或运用，都可以为杨殷研究打开一片天地，提升一个新层次和新境界。

四、纪念：为什么永远坚持

诗人臧克家曾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杨殷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也是光辉的一生，早已为历史所牢记；杨殷的思想、精神和人格，更始终激励着后来者和追梦人。

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说：“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共产党人杨殷的牺牲，同样引起了当时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同情。在共产党人中间也曾发出呼吁，“号召广大的革命群众，举行伟大的示威来答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以革命的实践来纪念我们被屠杀的领袖。”事实上，杨殷等革命烈士之流血牺牲，不但没有消减革命者和共产党人的革命热情，反而激励了广大人民和共产党人的革命斗志，加速了革命力量的凝聚和革命成功的进程。

新中国诞生后，党和人民始终没有忘记对革命先烈的纪念，作家刘白羽在《火光在前》中甚至高呼：“让我们永远纪念牺牲了的同志们”。有的学者也明确表示，“我们缅怀杨殷同志，要学习他以救国救民为己任，追求真理、与时俱进的思想品格”，“我们缅怀杨殷同志，要学习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我们缅怀杨殷同志，要学习他舍己为党、无私奉献、舍己为人的高尚品质”，“我们缅怀杨殷同志，要学习他密切联系群众，勇于开拓，苦干实干的优良作风”，并强调杨殷同志虽然离开我们已经很久了，“但他的历史功勋和崇高品质像一座城市，永远矗立在我们心中。我们今天纪念杨殷同志，就是要学习、继承和发扬他的革命精神，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奋斗的历史教育人、启迪人、警示人，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识党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历史道路，感受老一辈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英勇斗争精神，继承老一辈的优良传统作风，坚定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为在烈士的家乡广东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其实，对于革命烈士杨殷的纪念活动，中山市一直在不断探索和不断升华中有序展开。中山市委、市政府对城市发展的历史和文化遗存有着不同寻常的情结，尤其是对香山文化中的红色文化始终保持着深厚的感情，甚至将其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文化力量。在他们看来，研究是为了更有效地保存，保护是为了更深入地研究；研究是为了更好地传承，传承也是为了永久的纪念。在研究与传承中弘扬革命先烈的精神传统，在弘扬革命先烈的精神传统中更加深刻更加完整地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认同。

（作者系中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教授）